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21-08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基于厦门307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车鑫, 周毕芬, 赵清军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内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何去何从。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5个维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住房满意度达不到期望,在本地社会关系网较弱,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够强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城中村管理划入城市建设中,应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关键词:农民工;生活质量;描述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D4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4

一、引言

推进城镇化的前半程中,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特征明显,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储蓄仓,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刘易斯转折点的显现,促使农民工城镇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相较于2016年增加481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2016年增长0.9%,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数量呈上升趋势。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界限已经被放开,一旦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便会成为“边缘人”,如何有序管理这些劳动力便成为了摆在政府职能面前的一大难题。学术界认为,

城镇化的核心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定居地市民化以及户籍市民化两个部分^[2]。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会随着对城市的总体满意度而发生改变,而这个满意度是农民工通过平时的生活质量感受到的。生活质量直接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而使其产生相应的留城行为,可以说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调查是分析市民化水平的前提步骤。本文利用2018年3月厦门针对农民工的调查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进行测评。

(一)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词汇,国外将其称为农民移民(或移民工、劳工),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大量农民劳动力,大规

收稿日期:2018-05-2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农业人口转移背景下乡村精英培育机制研究”(FJ2016B084);福建省软科学项目“农民工城镇就业可持续性与市民化耦合及政策研究”(2017R0013);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就业可持续发展研究”(闽教科[2016]23号);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进程研究”(闽农林大社科[2017]8号)。

作者简介:车鑫(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本文信息:车鑫,周毕芬,赵清军.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21-28.

模离开原居住地进入到城市中的现象^[1]。在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并且市民化时,生活质量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当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主观质量与客观质量两大方面,实地考量时应从主客观两大维度入手。

以章国荣为首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收入和消费、住房、健康和就医、劳动时间、社会保障以及权益保护等 6 个方面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高低,并以此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刘渝琳、刘明等人在已有标准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完善,将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作为重要考察点,总结出就业状况、物质生活、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身心健康、精神生活等 6 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并且提出生活质量的提升是这 6 个方面相互协调统一的实现过程^[4]。杨云善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以及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农民工的身份没有转变,那么他们无法享有与市民同样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无法融入社会,最终成为“孤岛人”,生活将持续处于低质量状态^[5]。常韬等人根据对全国 20 个省区市的调查结果做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高低会因教育水平、工作质量、居住条件以及社会保障水平而发生变化^[6]。毕先进通过对农民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进行研究,认为劳动权益的损害、冒险工作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会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居住面积、工伤保险会从正向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7]。胡春梅等人从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环境领域、社会领域 4 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水平,得出公平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关键因素,呼吁社会应该更加注重农民工的心理需求^[8]。康绍霞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分析,以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婚姻状况为切入点,细化到居住、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 8 个角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最后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的结论^[9]。刘鑫利用 CFPS 数据来分析中老年农民工生活质量,得出包含个体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网络在内的社会疏离感与社会凝聚感会显著影响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10]。梁士坤从经济、社会、心理、制度 4 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民工的主观生活幸福感,以此来判断农民工目前的生活质量^[11]。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在分析农民工生活质量问题时,基本上都将就业水平、社会保

障、住房条件考虑在内,但大多都是基于常态化与短期性便可实现的因素而做出的因子分析,而轻视了需要长期磨合学习才能显出作用的因素,比如语言掌握度、城市归属感等,因此本文在已有基础上加入社会关系与心理认同指标,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生活质量测量指标构建

根据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分析,结合调查问卷,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 5 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生活质量,具体衡量指标见表 1。

表 1 农民生活质量程度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衡量指标
就业质量	就业稳定性	更换工作次数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就业满意度	日均工作时间 每月工作天数 平均月工资 有无工资拖欠 工作满意度
社会保险质量	保险覆盖度	是否购买医疗保险 是否购买养老保险 是否购买失业保险 是否购买工伤保险
住房质量	住房形式	现在的居住形式是怎样的 是否有住房公积金
	住房满意度	对于住房满意吗 对于住房安全满意吗
社会关系质量	社会网络情况	朋友圈构成 与本地人接触次数
	语言掌握力 业余活动	是否能听懂并且掌握本地方言 是否参加社区居民活动 是否参加社区居民选举活动
心理认同	身份认同	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群体
	城市融入	认为自己生活幸福吗 对城市有归属感吗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8 年 3 月份前往

厦门对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实地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厦门市不同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350份,回收338份,有效问卷90.83%。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调查对象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从而将农民工划分为新老两代不同代际的农民工^[12]。本次调查中的农民工大多来自于福建省,少数来自于河南、四川,因此将户籍划分为福建本省和省外两类。

在被调查的群体中,男性占52.77%,女性占47.28%。从年龄来看,17~26岁占比38.11%,27~36岁占35.50%,37~46岁占12.38%,46岁以上占14.01%。从教育水平来看,小学及以下占12.05%,初中学历占27.69%,高中占34.20%,大专学历占15.31%,本科及以上学历占10.75%。从职业分布情况来看,16.12%受访者为管理人员,21.19%为服务员,11.34%为工厂技术工人,2.09%为建筑工人,49.25%的受访者职业为其他。农民工户籍是影响他们与市民社会福利差异的一大重要因素,应该考察户籍地在市民化中起到的作用^[13]。此次调查中,福建省本省户籍比率为55.37%,外来地区户籍人口为44.63%。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据调查显示,身体状况不健康的农民工所占比率为26.38%,64.50%的农民工身体健康。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生活质量分析

(一) 就业质量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破解市民化困境、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加突出^[14]。就业质量会直接决定经济收入,虽然经济收入不能够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生活质量的测量点,但却是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2]。就业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综合体现出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而后农民工也会享受相应质量的生活。

1. 就业稳定性

根据问卷结果,农民工自从进城工作以来,更换工作次数由0~15次不等,94.46%的农民工转换工作次数在5次以内,无论是新一代农民工或是老一代农民工,皆追求尽量稳定的工作。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来看,43.65%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39.09%签订定期劳动合同,14.01%农民工所签订的合同为不定期合同,3.26%农民工

的劳动合同以完成固定期限的任务为准,可以看出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的劳动权益还没有完全得到保障。

如表2所示,农民工的就业总体呈现出不稳定性,就业流动性强,这是因为他们想要追求更好的待遇福利^[15]。相较于女性,男性的就业更加稳定。近三年来没有换过工作的男性农民工所占比例为16.05%,女性为9.66%,相差6.39%。新生代农民工变换工作次数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转换次数平均值分别为3次和2次,16.88%的老一代农民工表示没有更换过工作,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此项比率为11.74%,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更高。从户籍地来看,外省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更高,说明户籍所在地会影响农民工的未来定居落户意愿,并且外化为工作的更换次数,这与卢海阳的研究结论吻合^[16]。农民工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而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限制因素则是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他们对下一代的希冀更多的也在于教育。

2. 就业满意度

本次调查中,总体的就业满意度不高,44.21%的农民工认为当前的工作一般,45.70%的农民工对工作满意,10.09%对工作不满意。26.71%的农民工每个月需要工作26天,19.87%需要工作30天,21.17%每天需要工作10个小时,这一部分农民工整月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4000元,与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为3677元(东部地区)相比有所提升,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呈上升趋势。79.81%的农民工工资在1000~5000元范围内,5000元以上的比例仅为20.19%。

工资是农民工生活中一切物质活动的内生决定因素,从性别差异来看(见表3),男性的工资明显高于女性,月工资水平在5000元以上的男性农民工为31.48%,女性为11.03%,工资在2000元以下的男性比率为5.56%,而女性所占比例为6.09%。从代际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工资水平要不如老一代农民工,工资在5000元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所占比例为20.78%,高于新生代农民工18.61%。从省级差异来看,工资在4000元以上的省内外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44.7%和43.34%,本省农民工工资略高于外省农民工。从教育年限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

平的农民工工资主要分布在3 000元以下,占比51.35%,初中及高中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工资主要分布在3 001~4 000元,分别占比35.29%和28.57%,大专及本科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工资主要分

布在5 000元以上,分别占比34.04%和27.27%,表明农民工的教育仍然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大因素,教育所带来的回报与教育投资成正比。

表2 农民工变换工作次数

%

项目	农民工变换工作次数				
	没有换过	1次	2次	3次	4次及以上
男性	16.05	10.49	22.22	25.93	25.31
女性	9.66	15.17	25.52	28.28	21.38
新生代农民工	11.74	9.57	23.91	29.57	25.22
老一代农民工	16.88	22.08	23.38	19.48	18.18
小学及以下	16.22	27.03	18.92	16.22	21.61
初中	10.59	4.71	23.53	30.59	30.59
高中(中专)	14.29	11.43	22.86	26.67	24.76
大专	8.51	12.77	19.15	36.17	23.40
本科及以上	18.18	21.21	39.39	18.18	3.03
本省户籍	15.88	14.71	19.41	28.24	21.76
外省户籍	9.49	10.22	29.20	25.55	25.55

表3 农民工的工资分布

%

项目	农民工的工资分布				
	2 000元以下	2 001~3 000元	3 001~4 000元	4 001~5 000元	5 000元以上
男性	5.56	13.58	25.31	24.07	31.48
女性	6.09	34.48	28.28	19.31	11.03
新生代农民工	4.35	21.74	30.00	21.74	2.17
老一代农民工	11.69	28.57	16.88	22.08	20.78
小学及以下	21.62	29.73	10.81	27.03	10.81
初中	1.18	25.88	35.29	21.18	16.47
高中(中专)	4.76	20.95	28.57	22.86	22.86
大专	2.13	23.40	25.53	14.89	34.04
本科及以上	12.12	18.18	18.18	24.24	27.27
本省户籍	7.06	21.76	26.47	19.41	25.29
外省户籍	5.11	25.55	27.01	24.82	17.52

(二) 社会保险质量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点内容,牵涉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是农民工在城市内社会公平感的关键来源,也是生活质量的一大影响因素,本文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4方面来观察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购买情况,并以此评价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表4显示,当前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且参保项目不完整。城镇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达到43.00%,农村养老保险的购买比

例最低为28.66%,说明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民工仍然存在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的城镇参保率低于新一代农民工,整体参保率也低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落叶归根的思想有关,也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需求更高。最为明显的是,身体健康的农民工的参保率高于身体不健康的农民工,并且参保项目整体多于不健康的农民工。此外,本省户籍的农民工倾向于购买城镇保险,省外农民工倾向于购买农村老家中的医疗保险,这是因为本省民工更适应本地生活,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感受也会高于外省农民工。

表4 农民工社会保险购买率

%

项目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	农村	企业职工	农村		
男性	41.36	40.12	37.04	30.86	42.24	33.33
女性	44.83	35.86	38.62	26.21	39.16	33.79
新生代农民工	46.96	33.91	40.00	22.61	44.05	36.09
老一代农民工	31.17	50.65	31.17	46.75	31.17	25.97
身体健康	46.90	36.28	29.63	23.46	44.00	34.96
身体不健康	32.10	43.21	40.71	30.53	31.65	29.63
本省户籍	48.82	32.94	44.12	22.35	46.71	39.41
外省户籍	35.77	44.53	29.93	36.50	33.58	26.28
总体	43.00	38.11	37.79	28.66	40.79	33.55

(三) 住房质量

现在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城中村,将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分开,村内的基础设施也不及城市设施齐全完备,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或是由于没有长期定居的意愿,或是由于城市房价过高而自身收入不充足,难以在城市内买房,居住方式多以集体宿舍或者家庭集体租房为主。在本次调查中,仅有26.38%的农民工享受住房公积金福利待遇,80.78%的农民工居住在出租房内,10.75%住在集体宿舍,仅有8.47%的农民工已经买房。囿于买房需要承担的巨额费用支出,他

们更加倾向选择居住在相对来说成本较低的出租房内。

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住房质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表5显示,针对目前的居住方式,68.73%的农民工持不满意态度,针对居住安全的满意度高于居住条件满意度25.08%。无论在居住条件或是居住安全满意度上,普遍存在男性的主观满意度低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未婚农民工低于已婚农民工、外省农民工低于本省农民工的情况。居住满意度差的原因多源自于过高的房价,在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状况下,居住问题总是最先触动这个群体。

表5 居住满意度调查

%

项目	居住满意度		居住安全满意度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男性	67.90	32.10	42.59	57.41
女性	69.66	30.34	44.83	55.17
新生代农民工	70.87	29.13	45.22	54.78
老一代农民工	62.34	37.66	38.96	61.04
已婚	66.47	33.53	38.32	61.67
未婚	71.43	28.57	50.00	50.00
本省户籍	64.12	35.88	37.06	62.94
外省户籍	74.45	25.55	51.82	48.18
总体	68.73	31.27	43.65	56.35

(四) 社会关系质量

社会关系体现出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况,也体现出生活外拓程度,在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生活进行经济、住房、社保等的评价时,也应该注重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17]。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程度不乐观,有待改善。

本次调查中,58.63%的农民工朋友圈以工友或同事为主,27.36%的农民工主要与农村老乡联系,说明农民工的弱社会关系网络程度得到了提升,以血缘、家缘为主的强社会关系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削弱。根据表6可以看出,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接触率较低,61.89%的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接触较少。男性与本地市民接触多所占比例低于女

性0.68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接触较多的比例也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外省农民工与本地市民接触频率更是明显低于福建省本省农民工。在语言的沟通上仍然存在障碍,仅有35.83%的农民工掌握本地方言。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对自己进城的初衷达成感比较容易满足,这部分群体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学缘构成,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于社会的不公平感受很小,就算语言掌握度不高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故新生代

农民工的总体生活质量优于老一代农民工^[18]。

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也可通过业余活动来衡量,此次调查显示农民工参加社区居民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仅有9.45%的农民工参加过社区居民活动,其中只有5.54%参加过社区居民选举活动。此外,教育与农民工的社区居民选举活动参与度具有促进作用,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会越倾向于参加此类课余活动。

表6 本地的社会关系

项目	与本地市民接触			本地方言掌握情况	
	没有	接触少	接触多	听得懂也会讲	不懂
男性	16.05	59.88	23.46	35.19	64.81
女性	11.72	64.14	24.14	36.55	63.45
新生代农民工	11.74	62.17	26.09	33.48	66.52
老一代农民工	20.78	61.04	18.18	42.86	57.14
本省户籍	10.00	61.76	28.24	48.52	51.48
外省户籍	18.98	62.04	18.98	21.90	78.10
总体	14.01	61.89	24.10	35.83	64.17

(五)心理认同

身份认同是农民工适应并且感知城市生活的最后一环,通过在城市中长此以往的生活,农民工会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从而产生留城行为。此次调查发现,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感较低,60.5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25.73%还不能清楚地为自身身份定位。

根据表7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不强。男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低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中51.85%认为自己现在生活不幸

福,30.86%对城市完全没有归属感,而女性农民工的这两个指标占比分别为48.97%和19.31%。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知力度强于老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略低于老一代农民工。福建省本省户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比外省农民工高。感觉自身不幸福的省内外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50%和51.9%,对城市有归属感的省内外农民工两个群体分别占比77.65%和70.8%。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知与归属感均呈现“N”变化,说明教育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归属感。

表7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项目	主观幸福感		对城市的归属感		
	不幸福	幸福	完全没有	很弱	很强烈
男性	51.85	48.15	30.86	51.85	17.28
女性	48.97	51.03	19.31	60.69	20.00
新生代农民工	49.57	50.43	25.65	58.26	16.09
老一代农民工	53.25	46.75	24.68	49.35	25.97
本省户籍	50.00	50.00	22.35	57.06	20.59
外省户籍	51.09	48.91	29.20	54.74	16.06
小学及以下	62.16	37.84	35.14	40.54	24.32
初中	51.76	48.24	24.71	63.53	11.76
高中(中专)	49.52	50.48	25.71	54.29	20.00
大专	46.81	53.19	23.40	61.70	14.89
本科及以上	42.42	57.57	18.18	51.52	30.30
总体	50.49	49.51	25.41	56.03	18.57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整理了对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标,并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做出描述性分析。综合来看,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总体质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本省户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虽然现在农民工以亲缘、血缘、家缘为主的强社会关系已经弱化,但农民工更愿意将来回到老家,落叶归根思想仍然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关于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由于地理位置、受访者主观思想、调查地点客观原因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测评标准,因此本文所选择的测量指标是基于厦门市客观情况与受访农民工在回答问卷时的语言交流,这是本文的最大不足。今后的研究中,如果有较为权威的评价标准,那么文章的分析结果会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问卷调查的同时,与农民工的交流不仅限于问卷当中谈及的问题,据此,总结出以下启示:

(1)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累积,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可以具备更高的个人技能。个人技能会决定农民工可以从事的职业类别,当一个人从事较高的职位时,他的心理自豪感会提升,随之提高的还有整体生活质量,这种切身感受使得许多农民工十分注重子女教育。

(2)针对城中村,政府应该进行整改,调查时

很多农民工表示城中村的环保很不到位,整体的生活环境较差,这一点令他们很不满意。政府在着力加强城市整体市容市貌完善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的需求,统筹兼顾整体的发展。城中村建设的忽视,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在他们看来,他们与城市市民存在差别,心理落差会持续拉大,整体的生活质量会随着这种落差而降低。

(3)应该继续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拉低城乡社会保障的福利待遇差别,可以适当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福利,促使农民工增加购买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19]。目前我国的新农合与城镇医疗保险已经整合一体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多农民工仍然表示外来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不如本市人,很多福利仅限于本地市民,这说明社会保障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改革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停留于同市城乡的社保改革。

(4)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强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使他们感觉到社会公平,增强自身的生活质量保障。劳动合同是保障劳动者权益最重要的方法,应该加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以及未来定居意愿,不一定要签订定期合同,可以根据农民工的职业规划而设置不同类别的劳动合同。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加大监管,对于不懂法律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保障人身安全,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1]李开宇,李九全,王锴.基于城市社会地理学视角的农民工城镇化研究[J].人文地理,2011,26(5):39-42,132.
- [2]龚紫钰.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137-146.
- [3]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章国荣,盛来运,王冉.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研究,2007(3):13-19.
- [4]刘渝琳,刘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J].人口学刊,2009(1):31-36.
- [5]杨云善.制度供求失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及破解思路[J].求实,2012(3):48-50.
- [6]常韬,许萍,张立军.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调

- 查与分析——基于2012年全国20个省区市的样本[J].调研世界,2013(10):32-35.
- [7]毕先进.劳动权益、劳动条件与社会保障——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2):38-46.
- [8]胡春梅,曹成刚,何华敏,等.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组织公平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5):398-400.
- [9]康绍霞.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分析——以河南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5(16):118-119.
- [10]刘鑫.中老年农民工社会疏离感与生活质量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6.
- [11]梁士坤.代际延续还是适应转化: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城市适应理论的实证分析

-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2): 66-74.
- [12] 田新朝, 张建武.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13, 19(1): 2-12.
- [13] 王桂新, 胡健.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 人口学刊, 2015, 37(6): 45-55.
- [14] 张洪霞, 崔宁. 市民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全国 3402 个样本数据的调查[J]. 调研世界, 2014(11): 25-28.
- [15] 明娟.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工作原因、行业、城市转换维度[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38-45.
- [16] 卢海阳, 梁海兵, 钱文荣.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现状与政策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7): 26-36, 110.
- [17] 汤兆云, 张憬玄.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基于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的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7(5): 8-15.
- [18] 刘林平, 王茁.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 后农民工与 80 前农民工之比较[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53(5): 136-150.
- [19] 李迎生, 袁小平.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因应——以农民工为例[J]. 社会科学, 2013(11): 76-85.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a survey of 307 migrant workers in Xiamen

Che Xin, Zhou Bifen, Zhao Qing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flooded into citie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migrant workers' whereabouts. This article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living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five dimensions: employment quality, social insurance quality, living conditions quality, social relations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is not high, and the job satisfaction is also low. The coverage of urban social insurance is low, and the housing satisfaction does not meet expectations. The social network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s weak, and they lack of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villag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quality of life; descriptive analysis